

简论葛利高里及其悲剧意义

黎跃进

肖洛霍夫是前苏联文学史上享有广泛国际盛誉的作家。据八十年代初的资料统计,他的作品被翻译成88种语言,印数近亿册。1965年以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创作中体现的巨大艺术感染力,激动着世界读者的心弦。《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创作的最高成就。

《静静的顿河》背景宏阔,笔势汪洋,同时运笔细腻、精雕细刻各种场景,既整体地展示了俄苏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重大事件,又细致地描绘了人物心灵纤维的颤动,从宏观到微观,交织成多姿多彩的艺术画卷。有真实的历史记录,有想象的绚烂画面;有战场上残酷的砍杀,有树荫里缠绵的恋情;有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有悠然平和的田间劳动;有绮丽宁静的风光,有躁动不安的灵魂;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有实现愿望的欢欣;有醇厚朴实的乡土风情,有急风骤雨的社会斗争……内容丰富多彩,难以一一数尽。其中最令人感奋,激动着读者心灵的是主人公葛利高里,他的坎坷经历和悲剧命运,使人仰天长叹;他的高尚人格和美好情操,让人敬慕赞叹;他的内在矛盾和精神迷惘引人惋惜哀叹。

葛利高里作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哥萨克走进我们的视野,经过十年的曲曲折折,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三次卷入顿河叛乱,两次加入红军队伍,东奔西突,驰骋疆场,得到过勇敢的名声和少尉军衔。但失去的呢——十四次受伤,家破人亡,更有他心目中那块安宁平和的静土。他获得过短暂的快乐和欢欣,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伤,他为自己努力拼搏却一切落空而痛苦,他为他“漂来漂去”无法着实的灵魂而悲伤。一个强健勇敢的小伙子,不到三十,已经满鬓白霜。

对葛利高里悲剧的理解,苏联和我国学术界都存在分歧。在苏联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个人反叛”说,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根源在于他“同人民发生了决裂,走上了反叛的道路”,^①他来自人民又反叛人民。第二,“历史迷误”说,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反映了哥萨克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错误地理解了真理,是历史的迷误”。^②第三,“社会迫害”说,论者强调悲剧的社会客观因素,特别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方面寻找原因,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是“悲剧性的错误”^③的牺牲者的悲剧。第四,“探求真理”说,认为葛利高里是“真理探求者”,在他看来,革命不仅是经济和权利的再分配,还有精神道德方面的全新的东西。但革命有它的铁的逻辑,首先是以武力夺取政权,加上他富于力量和过于诚挚,因而酿成悲剧。^④国内论及葛利高里的悲剧成因也有许多说法,主要有“封建积垢”说,葛利高里的悲剧性在于他把封建积垢的“哥萨克观念”当成了“真理”^⑤。“性格悲剧”说,“葛利高里悲剧的主要冲突是个人意愿与历史发展的冲突……准确一点说,葛利高里的悲剧是性格悲剧”^⑥。“错综复杂”说,“造成葛利高里及其它哥萨克在国内战争中的悲剧性道路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哥萨克社会的客观复杂性和葛利高里的性格,使他不能不在选择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经历无数的波折和反复”。^⑦

文学上有一个普遍现象:一个成功生动的艺术典型,总会引起人们的不同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姆

①② 《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第108页

③④ 参看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王田葵,《论葛利高里的悲剧因素及其美学意义》,《零陵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⑥ 孟湘,《论葛利高里的悲剧美》,《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2期

⑦ 孙美玲,《论肖洛霍夫的创作》,《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莱特,堂吉珂德,于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这样的艺术形象。究竟怎样评价葛利高里,理解葛利高里的悲剧实质,才能揭示形象蕴含的深刻意义,解读作者的艺术构思,升华读者欣赏过程中郁积的激情?

首先,我们把葛利高里当作一个生命个体来看他的人格特征。在葛利高里身上,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表现出男性的力度美和哥萨克的野性美。小说中描写他的肖像:身材魁梧,比哥哥高出半个脑袋,“生着下垂的鹰鼻子,稍稍有点歪的眼眶里,嵌着一对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热情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紧地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葛利高里也和父亲一样有些驼背,甚至于在笑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也是一样粗野的。”^①无论在田野劳动,还是战场冲杀,或是恋爱调情,他都表现出剽悍、粗豪,但不乏机灵。

葛利高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与婀克西妮亚的恋情上。他之所以与娜塔丽雅结婚后还不断与情人往来,就是不能忍受妻子的冷漠,渴念情人的激情。同时,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情节,也表现了他热烈、执着和真诚的情怀。

善良、正直、光明磊落、不畏强权也是他的人格特征。在俄德战场上第一次杀人,内心充满着痛苦;哥萨克士兵轮奸波兰使女,他仗义解救,自己被捆着扔入马槽。面对压追,不管来自何方,他都会作出积极的反抗;他坦荡的胸襟中,容不得阴谋、暗害。即使杀人,也是在战场上面对面的厮杀,对于杀害弱者和俘虏,他非常厌恶反感。

在葛利高里人格意识的深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生活理想的探索。有论者指出:“在葛利高里身上,除了有乡土气息外,还有另一种民族特征:他对真理、正当的生活、对正义和合乎情理的社会秩序寻找。这象征着俄国人民在经历了所有残酷与严峻的折磨之后,在精神上所作的探索。”^②他向往自由和平的劳动,向往着没有仇恨、充满爱心的生活。但葛利高里的探索不是停留在精神上,而是伴随着强烈的激情和狂热的行动,他的人格力量决定了他的探索的特点。他是一个富于力量、长于行动的人,他的精神探索和积极行动几乎是同时进行。面对动荡的现实,他极力探索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一旦作出了抉择,他会奋力拼搏。而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的一个个美梦。

由人格特征表现出来的人的具体的行为,与具体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可以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可以在正负两极中滑动。如长于行动,也可以说是盲目;富于力量,但这种力量顺乎历史潮流受到肯定,逆乎历史潮流则受到谴责。对葛利高里行为的价值判断,难以在一端钉死,显得非常复杂。正是在这种复杂当中,在正负两极价值的来回砥砺中,更加鲜明了他的人格特征。我们看到的是洋溢着生命激情、不甘寂寞、努力拼搏的艺术形象。就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肖洛霍夫说他“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③。

其次我们把葛利高里当作文化载体摆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每一生命个体,同时又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种没有历史间断的文化,既体现在人的创造物中,也活生生地体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个人身上。葛利高里作为一个哥萨克,哥萨克的传统价值观念无疑在他的身上打着深深的烙印。

哥萨克是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逃亡到俄国南方边境的农民、家奴,他们不堪忍受农奴主和贵族的压迫,在无人管辖的顿河草原自由谋生,渔猎、放牧、耕作或掠夺过往商人官船。哥萨克力量越来越强大,沙皇派兵征剿,双方达成协议:沙皇给予哥萨克以特权,大片土地免征租税,哥萨克为政府担负戍守边关的任务。他们一边耕种一边服役,平时守卫,战时打仗。这种独特的地位和军事生活形成哥萨克强烈的自我意识、整体感、内聚力、优越感和排外性。由于地处边陲,比较封闭,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哥萨克的社会形态还保持古代宗法制的特点。落后、闭塞、保守、狭隘也是哥萨克文化的特点。而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顿河、艰苦的劳动和频繁紧张的军事生活,又形成他们一种特殊的豪放、剽悍和原始的粗野。这种文化因素在葛利高里身上的印记是非常清楚的。它制约着他的情感流程和性格走向。而影响他的命运浮沉的主要有三点:一是怀抱着哥萨克的“光荣”,一次世界大战中贾兰沙曾在他心灵中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但回家一趟,“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培养了一生的哥萨克

① 金人译:《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一部,第10页

② 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③ 《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气质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的真理”，又走上了战场，而且一直“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当上叛军师长，他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二是对土地的依恋和排外情绪。他卷入哥萨克叛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保卫哥萨克土地不被庄稼佬抢走，是他的重要动机。三是眼光的狭隘，往往被眼前的表面现象迷惑，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与波得捷尔珂夫和珂晒沃依的冲突说明了这一点。

分析葛利高里与哥萨克传统文化的联系是必要的，但把葛利高里的悲剧实质说成是哥萨克观念积淀的“封建积垢”又失之偏颇。第一，哥萨克传统是否就等于封建性，尚可探讨；第二，文化于个体的影响，是个不自觉的过程。“封建积垢”说的表述，似乎把葛利高里描绘成一个自觉的封建卫道士；第三，其实，葛利高里对哥萨克是有所反抗的。他的个性决定他不会全盘接受旧的传统观念。与阿克西妮亚的私奔，就是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抗议。他对哥萨克的野蛮风习也非常厌恶，他痛恨一些哥萨克奸淫掳掠的行为，曾因严禁部下抢劫而被革职。

葛利高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沉睡中的顿河草原人们。在一夜之间，迫使哥萨克放弃近乎古代宗法社会的传统习惯，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新、旧两种文化有一个互相较量的过程。葛利高里以他不满现状的个性，本能地倾向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撤下来，他很快参加了红军。但他这时并没有真正理解新的文化价值，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容许他作出冷静的比较和选择，很快又转向传统。但已变革的现实使传统的法则难以实行。他就是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寻求人生的道路。“在文化快速变迁的情境中……这需要在认识上进行一次复杂的重组，让个人重新形成新的世界模型，形成应付世界，寻找道路的新策略”^①。小说揭示的就是葛利高里进行“复杂的重组”的过程，这个始终伴随着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文化与社会是两种远胜于个人的强大力量。个人在他们面前显得异常渺小，希望超越它们，战胜它们的个人，注定是一场悲剧。

综上所述，葛利高里作为生命个体，有着美好的个性，他的向往和探索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哥萨克文化的优缺点。十月革命的动荡现实，新、旧两种文化发生剧烈冲突。葛利高里的性格气质，把他推到冲突的尖端，新旧文化冲撞的尖锐、复杂，体现在葛利高里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场具体生动的悲剧。革命对顿河草原变革的急剧性、哥萨克生活的急拐弯，更强化了这种悲剧性。

作家对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如何？自《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发表后，一直存在着“肯定”和“谴责”两种说法。从作品实际看，肖洛霍夫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展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必然性。革命，需要付出代价，人类历史的前进，总会有牺牲。当然，作品中的某些局部，对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革命领导者的某些错误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牺牲作了艺术的批评。但从整体上看，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揭示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的确，十月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虽然革命过程中难免某些失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错。而在革命浪潮冲击下饱经磨难，备尝艰辛的葛利高里也没有错。作为生命个体，他有温饱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现实生活的急流中他作了种种抗争和追求，他的每一生活转折，都有其内在依据和必然性，无论当红军还是做白匪，都是面对外在情势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他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的、富于人性的、能显示自我力量的生活。

都没有错，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西方哲人黑格尔说过：最深刻的悲剧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善与善的冲突。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价值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它总是在两种力量的搏斗中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从人伦、情感的角度来看待文明的发展，看到的是残酷，对双方都不能接受。但这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主宰社会的总会是搏斗双方中的一方。

人类不愿意残杀，但又必须残杀。在这两难的境地中，人类痛苦地选择着艰难的道路，但总是没法走出“圆圈”。这不仅是葛利高里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静静的顿河》艺术地展示了人类生存的这一严酷事实。

① 基辛，《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